



# 斯诺通讯特写选

新 华 出 版 社

# 斯诺通讯特写选

刘力群 选编  
洪允息 等译

新 华 出 版 社

G151512  
S N

## 斯诺通讯特写选

刘力群 选编

洪允息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插页2张 124,000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4,800册

统一书号：7203·126 定价：1.35元

405156-10

1102

## 编者的话

本书展示给读者的，是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上半期我国的一幅幅真实图景。当时，斯诺还是一个血气方刚、初出茅庐的青年记者。

一九二八年夏，二十二岁的斯诺乘坐“雷德诺”号轮船从纽约港出发，经夏威夷、日本，于秋季到达上海。他原来只打算在中国旅行六个星期，可是后来却过了十三年才重新返回美国。十多年中国的风风雨雨，使他受到了吹打和磨炼，从一个“年轻好奇、不存偏见”的离开学校不久的美国大学生，变成了一个深沉老练、闻名世界的新闻记者。

在中国期间，斯诺曾先后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副主编，《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美国统一报业协会驻东南亚旅行记者，《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为这些报刊以及其他许多报刊写了大量的通讯和特写。本书收入的文章，是从一些早期英文报刊中选出的，除一篇写于抗日战争期间外，其余均写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即斯诺一九三六年去陕北访问红军之前的一段时间。

旧中国是不堪回首的，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尤其黑暗。斯诺早期在中国写的通讯和特写，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凄风苦雨、衰

鸿遍野的年代。对于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来说，了解过去有好处，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就是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回顾过去也可以更好地瞻望将来。斯诺作为一个客观、公正、同情中国人民的西方记者，通过亲眼所见，将我国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些真实图景纪录下来，其着笔的角度，报道的深度和广度，与当时的中国报刊有所不同，许多段落是根据第一手材料写成的。这样，斯诺早期在中国写的通讯和特写就具有其特殊的价值，是我们学习历史的一面镜子。

对于我国新闻工作者来说，可以从斯诺的通讯和特写中学到许多写作技巧，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学习他深入现场，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采访作风。斯诺很爱说：“我是一个密苏里人。”这是一句美国谚语，意思是“我是不轻信的，请拿出证据来。”斯诺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他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二是表明他坚守一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采访作风。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曾说过：“斯诺对他所报道的事件了如指掌，因为他到过现场。当他报道一个事件时，他一定目睹过它。”本书编入的《拯救二十五万生灵》一文，是斯诺不顾一些中国官员的阻挠，深入内蒙灾区采访后写出的；《中国洪水纪实》一文是斯诺在腿疾未愈的情况下，通过对长江中下游水患区的实地考察写成的；书中人物特写所报道的著名人物，斯诺都亲自采访过，甚至还与其中一些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样评价斯诺：“斯诺怀着乐观和深情看待世界，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要探索并验证出他耳闻目睹的一切——他不愧是凡事都要看证据的密苏里人。”

斯诺在他一生四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作品当然要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然而，这一成功

并不是偶然获得的。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斯诺在出发去陕北以前，曾在中国作过大量的实地考察，跑过许多地方，采访过众多的人物，写过大量的通讯和特写，这样，就为他后来的成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西行漫记》中有许多背景材料，来自于斯诺早期的中国通讯和特写。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作过这样的论述：“当一九三六年六月访问红区的时机来到时，斯诺已经通过多年的专业工作进行了很好的准备。这种专业工作不仅是采写新闻，而且是记录中国的历史。……这里，是一个经过充分准备、具有报道能力的记者，成功地捕捉到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良机的实例。”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斯诺早期在中国的实践、学习和探索过程。

斯诺在考察陕北苏区前，思想上也经历过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本书为研究这一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斯诺刚到上海时，曾错误地认为“革命已经过去，中国已经统一”。不久，他在内蒙萨拉齐看到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思想上受到巨大震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的“一个觉醒点”。后来，他又在中国各地看到政治腐败、军阀争斗、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现象，对国民党鱼肉人民、丧权辱国的行径深感痛恨，逐渐寄希望于以鲁迅、宋庆龄为代表的中国进步力量，以致最后终于冒险去大西北找寻中国的红星。他从一个富有同情心、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西方记者，逐渐变为一个有正义感的进步记者和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了解斯诺这一思想上的发展过程，那么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如果发现斯诺早期在一些政治问题上态度尚不明朗，或对国民党中的一些右派人物曾抱有幻想，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我们应历史地看问题，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苛求当时的斯诺。况且，上述一些段落是少量的。书中的大量文字都证明，斯诺无愧于一个第一流的记者。斯诺经

过一些年的调查了解和独立思考，不苟同于其他西方记者，在自己写的报道中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揭露，对中国进步力量予以赞颂。这些都说明，斯诺后来所以能写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红星照耀中国》，不仅有其新闻工作的基础，也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斯诺一生共写了十一本书，此外还写了大量的通讯、特写、评论和社论，散见在数十种外国报刊中。这些文章是斯诺新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没有引起注意，今后还需下大力去开发。本书的选编、翻译和出版，就是这一开发工作的初步尝试。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前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的关怀和协助。书中最后一篇文章《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是洛伊斯·斯诺提供的；现年已七十七岁高龄的海伦·斯诺，还特地为本书写了长篇序言。本书除编入由洪允息、刘力群、蔡焰同志合译的十二篇文章外，还收入友美同志译的《她为中国民众而战》和佩云同志译的《白话大师——鲁迅》。后一篇曾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上发表，因内容重要，读者又不易觅得，故将其编入，以饕读者。书中注释均为编者所加。在此，特向本书的赞助者和各位译者表示诚挚的谢意。选编工作中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刘力群

一九八四年八月

# 序

海伦·福斯特·斯诺

一九八四年五月，我的助手雪伦·估莲女士到中国旅行，拜访了我的一些老朋友和新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斯诺的人员托她带信给我，说他们正在将斯诺早期在中国写的一些通讯、特写翻译出来，编成一本名叫《斯诺通讯特写选》的书，并希望我为该书写一篇序。我非常高兴中国现在能我们将过去写的一些东西利用起来。由于事隔久远，手头又无那些剪报，因此我只能根据随信送来的一份《斯诺通讯特写选》目录和自己的回忆，向中国读者大略介绍其中一些文章写作的背景与经过。

埃德加·斯诺于一九二八年离开美国，年龄二十二岁。当时正值美国经济繁荣的顶峰，但这一时期只持续到一九二九年，以股票市场的狂跌而告终。接着就是严重的经济危机。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导致对战争物资的需求，使美国的经济潮流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从来没有使经济恢复到正常的平衡状态，直到今天，用于出口的武器和五角大楼的所谓“国防”开支仍在国民生产中占有巨大的比例。政府要从国家预算中拨出巨大的款项用于武器生产以及所谓公共“福利”，这两个方面不仅不产生经济效益，而且有碍于生产，所带来的问题比政府



官员试图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斯诺和他的哥哥霍华德于一九二六——二七年间离开家乡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去纽约，因为那时纽约是一个可望获得巨大成功的地方。兄弟俩租了一套公寓，与著名的影星和乐队领唱布迪·罗杰斯住在一起。看起来，埃德（埃德加·斯诺的爱称）和霍华德都在通往成功的阶梯上飞速攀登，两人都信心十足。埃德当时还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以继续他在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未完的学业。那时，广告业是各行业中的明星，埃德和霍华德在广告业中初试身手，获得了成功。霍华德很快成为广告业最高组织——全国制造商协会新英格兰州分部的一号经理。

埃德加·斯诺在上海密苏里记者帮里排行老三，他是约翰·本杰明·鲍威尔<sup>①</sup>的弟子，而鲍威尔又是托马斯·密勒<sup>②</sup>的弟子。我到中国来时，也带有老中国通（斯坦福大学校友）写给鲍威尔和密勒的介绍信，同时还有一封写给当时《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利特·阿本德的介绍信。当我一九三一年来到中国时，驻华记者因其著作而享有名声的只有两人，一是密勒，他写了几本支持国民党的书；二是阿本德，他写了《受难的中国》一书，于一九三〇年出版。阿本德是我父亲的斯坦福校友之一，我们刚一见面，他就让我借他的书读。

我在写这篇序言时，手头有一本旧的黄色封面的《受难的中国》，它对中国作了这样的描述：“今天，中国的境遇坏得不能再坏，比十九年前还要糟糕，……过去四年，中国是每况愈下……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今天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中国人民无力

---

① 曾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编。

② 《密勒氏评论报》的创始人。

自救。”

这本书应该成为中国每一个青年人的必读书，它将使青年人懂得，当一九四九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那究竟意味着什么。阿本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象毛泽东这样一个人，竟会从病入膏肓，束手待毙的中国中产生出来。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去陕北访问毛泽东的大本营，写出他著名的经典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西行漫记》），在此之前，所有的外国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相信中国会造就出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那时，中国是人所共知的“东亚病夫”。一九三〇——三一年，中国通商口岸的人们都认为中国已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不仅是一部考察纪实，也是当时历史的一部分。就是今天，它仍是外国人所能写的有关中国的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就其对当代世界的影响来说，它甚至比中国人自己写的书还有影响。它从第一页起就具有真正的魔力，其内容不是发明创造，而是客观情势的一部分。无论埃德还是我都是传统乐观的美国人，在一般那些极度的悲观派看来，这是一类幼稚的人物。我们为什么会处于那些人数极少、相信“中国能够站立起来”的旁观者之中？仅仅才过了十九年，毛泽东就在获取全中国后登上了天安门，那时我们并不十分惊讶。无论是我的书或埃德的书，其内容都没有任何需要修改的地方，因为我懂得什么时候要对“客观情势”作出估计，什么时候要预见未来。当然，我是指书中对历史大事的记载毋需修改，这不包括时间、地点等一些细节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是完全独立的，没有指导，没有理论，没有顾问。我们认识各种类型的人物，必须“从事实中

寻找真理”，而不是墨守任何前人的种种预言。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要对你自己或其他的人撒谎。去寻找真理，真理会使你自由，至少会使你立足于如同我总是说的“完全正确”的地位。

那也是毛泽东的秘诀——他讨厌各种谎言，如果有人对他撒谎，他会发怒。董必武也是如此，有一次，他曾试图发动一个严肃认真的讲真话的运动。

埃德加·斯诺为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写的第一篇文章大概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中国的五大害》。但是，他没有发现那些从股票交易中大发其财的外国侨民，他们绝不象陷于无望、悲惨境遇中“受难的”中国民众那样惶恐赧赧。他为《美国信使》杂志写了一篇讥笑美国人道德堕落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八月，题目是《侨居上海的美国人》。我将那篇文章剪了下来，带着它来到中国。我不喜欢那篇文章，并在与埃德刚见面时就告诉了他，这刺痛了他，也使他醒悟过来。“这篇文章是在卖弄青年人讥笑长辈的‘小聪明’”，我告诉他，“就象《美国信使》的其他文章和其主编H·L·门肯一样。”我还说：“你大概不知道，自从你离开美国后，国内出现了空前的经济萧条，现在人们不再把卖弄‘小聪明’看成十分好玩的事了。”

这句话使埃德感到振聋发聩。他不喜欢被人称作是在玩弄“小聪明”。由于这篇文章，他被上海的外国侨民（不仅是包括鲍威尔和密勒在内的美国侨民）拒之于门外。埃德最不喜欢被人疏远。

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埃德加·斯诺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的长篇通讯。当时，能够在—一个发行量居世界之冠的刊物上发表这样一篇通讯，是一件大事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首次攻打上海，此后，没有人知道日军将于何时再次发动进攻。然而那时每一个人都明白，战事迟早会爆发。尽管外国列强竭力阻止日军占领中国整个海岸线，但在一九三七年，中国沿海还是被日军迅速占领。三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任何使人欢愉的事，到处都是这样。在一九四九年前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日本人赶出了中国。我把上海看作是一个“长在中国身上的癌瘤”，当一九三八年约翰·根舍初到上海时，我就是这样对他说的。那时，国外的局势也几乎与中国内地一样糟糕。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利特·阿本德在《受难的中国》一书的末尾指出，中国已完全瓦解了。他写道：“就是从人道主义的态度出发，也应该立即提请世界各方关心中国，想方设法迅速救援那些无力自救的人们。”

无论中国人或是外国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的人，都一致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实行自救。这种思想在各地蔓延，就象致人瘫痪的毒剂一样。

就在这时，中国出现了自救性的工业合作社。“工合”运动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业。我在一九三八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工合”思想的文章，题目是《日本的吸血鬼政策》。这篇文章后来被美国《读者文摘》转载。接着，埃德就发表了那篇关于路易·艾黎的文章，它极大地推动了为“工合”筹措资金的事业。但是，重庆的中国官员却不喜欢这篇文章，他们不想让外国人通过自己的工作得到荣誉。三八年后，有人就想把艾黎赶走，但是外国舆论使这种打算成为一种不明智的举动，因为艾黎筹集的资金对中国有重大关系，是一种善意的行动。一九四三年，中国的右翼分子把艾黎从官方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中排

挤出去，但他后来却成为美国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工合”在一九五二年停止了活动，在那以前，艾黎的工资和活动经费主要由美国委员会提供。“工合”的最后一个活动点是甘肃山丹县的培黎工艺学校。这个学校于一九八三年在北京恢复。

那时，我掌握了全部的有关艾黎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和艾黎在新西兰的家人提供的情况。我一个劲儿地催促埃德将文章写出来，尽管他也想到《星期六晚邮报》可能不会采用此稿，重庆政府将会反对这篇东西。一九三八年，国际促进中国工合委员会委派我和埃德主管在美国北部和南部开展公共宣传，但我们实际上几乎承担了在世界各地开展宣传的工作。象往常一样，大部分事务性工作必须由我来做。

埃德加·斯诺是怎样认识路易·艾黎的？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埃德写的一篇关于中国西北地区大饥荒的实地报道，题目是《拯救二十五万生灵》。就在那次旅行的途中，埃德看见从列车的下等车厢里钻出一个粗矮结实的外国人，便上前与他搭话。他就是路易·艾黎。然而在后来的一些年中，埃德对艾黎一点也不了解，既无通信，也未见面。直到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后，埃德才在上海见到了他。那年十一月，我从北平来到上海，经埃德介绍我认识了艾黎。我们就日军对中国工业的侵占进行了讨论。埃德和艾黎不断抨击中国政府，指责它没有在日军进犯之前将大工厂迁走。然而，我的意见却是用合作社的方式建立小工厂，把难民迁往内地。我竭尽全力将埃德和艾黎说服。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他们都赞成我的意见。对于这一事实，却没有任何人提及，<sup>①</sup>尽管我为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工作花费了许

---

<sup>①</sup> 指一些报刊在介绍“工合”历史时，忽略海伦·斯诺是“工合”发起人之一，对她的工作没有给予一定的评价。

多时间和精力，为它工作了十二年，直到一九五二年为止。从一九三八年到如今，我一直在推进工业合作运动。

斯诺的这篇文章是新闻记者要研究学习的一个范例。它显示了报刊的威力，而且，它在向《星期六晚邮报》所拥有的中间或保守的读者介绍一种新的左翼运动方面，是一个杰作。斯诺的文章深入到真正的美国人中——他们就是《星期六晚邮报》一百多万的订户以及二、三倍于那个数字的读者。由于这一点，《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一文便成了一个例证，说明斯诺在左翼记者中可能要算最成功的一位。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工合”这一奇迹般的事业便不会得到如同后来那样的进展，这样的说法是不过份的。

让我们再检视一下当时的情况。

作家、艺术家以及任何从事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的人，都应该懂得如何保护他或她的心理状态。埃德加·斯诺从一开始就始终懂得这一点。他除非感到一篇稿子肯定不会被拒绝，否则他决不把稿子寄出去，甚至不去写它。成功主要来自于自信。只有很少几次，埃德反其道而行之。现在我能够记起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一九三三年埃德寄给《星期六晚邮报》的一篇题为《西方威望下降》的文章，埃德当时感到，它肯定会被退回不用。这篇文章对其他任何刊物来说都是太长了。这样，埃德就同意把文章寄给《星期六晚邮报》。当时，邮件寄到美国需要数星期的时间，我们手中的钱也所剩无几。这真是一次大的赌博。使埃德大吃一惊的是，它竟被采用了。也正是由于这篇文章，埃德后来与《星期六晚邮报》的主编本·希布斯和外国新闻版编辑马丁·萨默斯成了工作上的搭档。他们从没有要求埃德辞职。一九五〇年，埃德辞去《星期六晚邮报》副主编的职位是自愿的，因为他不同意希

布斯和萨默斯当时攻击毛泽东新中国的新的反共编辑方针。

就我所知，埃德的文章被退回不用的仅有一次。他曾经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在一九三三年进行蜜月旅行的文章。那时，我们从日本出发，到了台湾、婆罗洲、西里伯斯岛、爪哇、巴厘，然后经过新加坡，沿着海岸线到了香港和广州；接着到了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其中也包括上海；沿此航线，我们到了天津，最后定居北平（一九三三——三七年）。埃德当时很有把握，认为《纽约先驱论坛》杂志的主编威廉·布朗·梅洛尼女士肯定会喜欢这么一篇妩媚动人、温馨甜蜜的关于两个年轻人在东方旅行的文章。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把他的新娘说成是“美丽的、值得崇拜的”云云，以致于梅洛尼女士认为那篇文章是“青春少年”的夸夸其谈。

梅洛尼女士断然拒绝刊用那篇“温馨甜蜜”的文章，而且还把埃德“青春少年”的举止奚落了一顿。通过这件事，埃德第一次意识到那些控制报刊的女门阀是多么的冷酷，她们把一切“美丽的”少女和家庭主妇拒之门外。他不知道，美国妇女中一直存在着内战，一方是作为“妇女口舌”的斗士们，她们要求与男人一样的权利；另一方是操持家务和社会日常生活的其他妇女，她们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屈居第二位。

自发生那件事后，埃德只要有可能就尽量不在他的文章中再提他“美丽的妻子”。他被梅洛尼女士深深地刺伤了。同时，他也不再在文章中表达他个人的情感甚至他个人的政治观点。那件事激怒了他，他不想让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现在再谈《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一文。当时，无论我还是埃德对于它能否被采用都是没有把握的。埃德只要走错一步，他的文章就再也不会被《星期六晚邮报》刊用。该报的编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知道他的思想色彩是混合交错

的。

事情的最后结果显示，《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们都很喜欢那篇关于艾黎的文章，并且也不反对任何缀有“合作社”这一温顺名字的事物。这件事恰恰精确地说明了一九四一年美国公众舆论主流所含有的左、中、右势力的倾向性。事实上，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九年，当时开始了冷战，麦卡锡主义紧随其后。

正是因为我在一生中有过搞“工合”运动的经历，我才坚定地相信，生产者合作社，特别是工业合作社，是唯一的联结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的桥梁，甚至是使新兴国家之间互相联结的桥梁，同时也是联结一个国家内部各个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桥梁。

埃德写的关于路易·艾黎的文章使整个形势对“工合”运动有利，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以及中国也是如此。因为在那之前，“工合”的威望还没有树立起来，如果说艾黎的对手正甚嚣尘上，那么艾黎却逐渐在被人们忘掉。埃德文章见报之时，正是他在中国生活十三年后乘中国民航班机飞回美国的时候，在那以前，甚至纽约都没有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的活动。

一九四〇年，美国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终于成立了。从一九三八年起，我就一直给哈里·普赖斯和其他的人写信，敦促成立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因为当时国外的关心和援助对于“工合”运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没有这些，车轮就无法转动。

就在那时，伊万斯·卡尔森促使退休海军上将哈里·亚纳尔成为美国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主席，但他工作并不积极。当时的书记是海伦·卢米斯；艾达·普鲁伊特是“中国代表”，她于一九三九——四〇年间离开中国。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艾达·普鲁伊特写给我一封信，信笺的底部印有“顾问委员会”的名单，那是一



个人数很少的委员会。艾达·普鲁伊特做梦也没有想到，《星期六晚邮报》会使“工合”和路易·艾黎荣光显耀。这都应归功于埃德加·斯诺的天资和他那能同形形色色的人沟通的杰出才能。

埃德的文章就好象一架飞机，依靠它，整个“工合”运动第一次腾空而起。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载有埃德文章的《星期六晚邮报》以闪电般的威力轰动了大大小小的售报摊。这样，我们就能够把各种类型的人吸引到我们这架犹如游行队伍中打头阵的乐队车一样的飞机上来。

我不能强求新闻系学生“向埃德加·斯诺学习”。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专家，其他人无法同我相比。但是，我自己总是没有很好地向埃德加·斯诺学习，尽管我总是保证埃德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他自己的事情。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向他人提供各种材料，就象送发医药用品一样，因此很难发表，即使发表了，也很少有人去读。埃德经常对我说：“能使这样的东西发表出来，大概只有你才能做到。我真不明白这样的事是怎么发生的？”他的意思是，我的作品总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赚钱，甚至不是为了发表或让人去读。对于我的作品，我自己也常常感到它们肯定不会被出版商或杂志社看中。这样，在我的小屋子里就堆放着三十五本没有被发表的书稿，我从来都没有把它们寄给任何一家出版商。每一部书稿都是有价值的，内容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是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写作的。但是，它们没有经过剪裁以便读者接受。事实上，自六十年代以来我都不知道我是否还有读者。使我高兴的是，我听说中国正有人在翻译我最近写的一部分著作。我现在每年都要写一部书，包括回忆录、思想札记、哲学思索以及任何涌入我脑中的思绪，我称它们为“漫长的思考”。

这里，我还可以把当时埃德加·斯诺写作《路易·艾黎——